

【山师学人系列】

□刘增人

# 书新先生

我知道这些回忆绝非“经国之大业”，更未必有多少人会感兴趣，但积存心底，对我是一种过重的积压。

书新先生是我在山师中文系读书时的老师，后来又任泰安师专做过一段“同事”，但他的经历，我却并不十分清楚。最近才有幸得知，他本名伊淑身，山东蒙阴野店公社石泉大队人，1931年1月生，1944年参加革命，任儿童团长，1946年参军、入党，改名书新，1958年毕业于山师中文系并留校任教，曾任中文系副主任。1963年从山东师院调至泰安师专，任中文科主任。1979年9月，调回山师。1985年病逝于济南。长女伊林，曾在山东省中心血站工作；次女伊凡，在北京从事幼教事业；师母乔彩娥，约五年前因心脏病猝发谢世于北京。

我读书的时候，他教授我们年级的现代文选课，只教了《暴风骤雨》、《王贵与李香香》等极少的篇什。因为又黑又瘦，而且总是不自觉地脑袋微微颤抖，老师们于是把他和另一位白白胖胖的也是教授现代文选课的先生并称为“柬埔寨双杰”——一位亲王，一位首相。学生们也非常敬佩各位老师的观察力和概括力，因为实在是大像！

1963年，我毕业了，因为先父有“历史问题”，几位教研室主任让我留校的建议被合情合理地否决，我就和三位师兄一起到泰安教师进修学校报到。书新先生也由山东师院中文系副主任调任泰安师专，负责组建中文科。后来才知道，他同意调离，有两个条件：一是选几个应届毕业生，二是

泰安出一笔钱，让他采购书刊，筹建中文科、系必备的资料室。但我进校后被分派到函授部教课，并不归书新先生领导。1964年暑假前，我因为刚刚熟悉了古代文学，又被安排改教现代文学，于是向书新先生“诉苦”，这是第一次正式接触书新先生。

“文革”开始后，书新先生的遭遇是极其悲惨的。主要罪名之一，就是花费学校有限的经费，到上海购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版的书籍与刊物，“贩卖三十年代文艺黑线”，是他最重的罪名。他买来的《萌芽》、《拓荒者》等“左联”期刊，也被堆积在教学楼大厅，横七竖八捆在一起，打上一个又一个大大的叉号！其次是他的出身地主，却混入党内、军内，是标准的“阶级异己分子”！

1973年，书新先生的“历史问题”，经过不知几多内查外调，终于无法定为阶级异己分子，即他入党、参加革命并非为了混入党内伺机“破坏”，所买的刊物，虽然有“黑货”，但也有不少是鲁迅主编的。他这才从“牛棚”“解放”出来，但从此终日枯坐，或者拿一张纸，画来画去，既不是字，更不是画。每次造访，见到他的规定动作，就是抽烟。

这年暑假，被迁移到曲阜的山东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的诸位先生，邀请山东师院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的同行到曲阜研讨此时此刻

的教学问题，书新先生被他在山师的同事邀请，他还带我同行。会上，各位先生都在犯愁，这现代文学处处是“禁区”，真不知该从何下手？好像那次讨论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成果，就各自打道回府了。路上，山师的老师们建议泰安师专的现代文学教研组编写一部用鲁迅自己的话说明鲁迅是个什么人的鲁迅语录。因为那时只有用鲁迅自己的话，才有可能从“石一歌”们的“鲁迅叙事”里“突围”。我们欣然赞同，回校后马上动手，正好得到新出版的内部印刷的《鲁迅日记》与《鲁迅书信集》，可以借以澄清若干人为的谜团与假象。

1974年底，书编完了，出版又成为问题。直到1979年，这部“起死回生”的书，终于由山东人民出版社推出。那时出书是没有稿费一说的。责任编辑向社领导打报告，以刘某家庭生活困难为由，申请到“生活补助费”600元。书新先生领到后，立马写信让我到山师去取。他刚调回济南，还住在学生宿舍底层拐角的一间房子里。我到他住处，只见他左顾右盼，确信四周没有人看见，才从盛纸面粉的小缸底部取出用报纸层层包裹的600元。然后说，这里不安全，到操场上去分吧。我拿到300元后，他叮嘱我要分成5份，分装在不同的口袋或提包里带回泰安……

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没有以真名署名，而是化名为

“舒汉”。从那时到现在，很少有人知道这是我们师生合作的产物。当我出版这第一部书的时候，吴福辉、钱理群、王富仁等略年长于我的学者，还都是在读的学生；而今，他们在学术上的建树早已令我无法望其项背了。这部书，倒成了我出道早、进步慢的佐证！真令人浩叹天道之诡异。但也并不尽然。2006年，我到上海鲁迅纪念馆参观，馆里的李浩先生带我参观他们的一面展览墙，上面密密麻麻排列着各个时期出版的鲁迅研究著作。他指着《鲁迅生平自述辑要》对我说：这是新时期出版较早的一部书，其中较少有“文革”遗风，可惜不知道作者。我不禁失笑起来，说这回你问对人了，作者之一，就是鄙人！他颇为吃惊，说这部书很有价值，应该重排再版。我也很兴奋，希望能够重新编排，以全新的面目问世，告慰书新先生。但联系了几家出版社，都索价不菲，我只好长叹而已。

书新先生作古已经多年。长夜多眠，这些琐屑的往事，却总是挥之不去。我知道这些回忆绝非“经国之大业”，更未必有多少人会感兴趣，但必有存心底，对我是一种过重的积压。或许《齐鲁晚报》能够给我一个解脱的机会？那就谢天谢地，谢谢新的生活吧。

(本文作者为著名学者、青岛大学教授)

故乡有座凤凰山，山上有块“抱碗石”。该石高可数丈，奇崛兀立。近看，酷似一老人，五官皆具，轮廓分明，身上一丝不挂，唯独两臂紧抱着一只“金碗”（浅黄色的凹形圆石），故名“抱碗石”。阳光照射下，“金碗”闪闪发光，而“老人”却骨瘦如柴，面容悲戚……传说很久以前，有一老农，终日辛勤劳作，日子过得也殷实。有一次，他在田间刨地时，意外地刨出一只金碗。他大喜过望，忙扔下农具，兴高采烈地把金碗抱回家。从此以后，他把全部心思都放在这只金碗上，白天怕人看，夜里怕人偷，放在屋里怕招贼，埋到地下又怕盗墓。最后干脆将金碗抱在怀里，与之形影不离。这样一来，他终日足不出户，无心种田，结果田园荒芜了，庄稼绝产了。他也在粮断草尽中抱着金碗活活饿死……他死后，就变成这块大石

【若有所思】

## “物困”之惑

□戴永夏

头，风雨千万年，栖身荒山中，只能用其形体语言来诉说自己的“悲剧人生”……

这传说尽管离奇荒诞，却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饱含警世哲理。生活中确有这样的人，或为财迷，或被物困，执迷其中，难以自拔。他们在为之痴迷的“爱物”上耗尽了心血，结果却反被其累，反受其害，忧愁烦恼一世，以至于毁了一生。

世界上像农夫一样为物所困的人固然很多，但能及时觉悟，走出困境的也不乏其人。我听说过一个“紫砂壶”的故事，就很值得称道——

有一个老铁匠，专以卖拴狗链子为生。每天，他将铁链摆在门外，自己躺在门里的躺椅上，一边听着收音机，一边悠然自得地品着紫砂壶里的香茶。他每天的收入，正够喝茶、吃饭的。虽然并不富裕，但他却过得无忧无虑、有滋有味。

一天，一个文物贩子路过这里，偶然看到他身旁的那把紫砂壶——古朴雅致，紫黑如墨，绝非凡品。再仔细看，只见壶嘴处还印着清代制壶名家戴振公的印章，更证明这是件价值连城的“珍宝”。于是他出10万元的高价要买这把壶。老铁匠一听这个数字，大吃一惊。壶虽没卖，但他心里再也难以平静。没想到这把用了几十年的普通茶壶，竟是一件珍宝！从此，这把壶让他牵肠挂肚，提心吊胆。过去他躺在椅子上，都是随意把壶放在小桌上。现在又怕碰了又怕摔了，壶放在哪里都不放心，眼睛时刻不离左右，这让他很不舒服。特别让他难以容忍的是，当人们知道他有一把价值连城的茶壶后，便蜂拥而来，有的向他讨要其他宝贝，有的向他借钱，还有的半夜三更来敲他的门，搅得他心力俱疲、寝食难安，生活秩序被彻底打乱了……他终于明白，这一切烦恼、恐惧、不安，都来自这把紫砂壶！

当那个文物贩子带着20万元现金再次登门购壶时，老铁匠再也忍耐不住了。他招来左邻右舍，当着大家的面举起斧头，狠狠地向那把紫砂壶砸去……从此以后，“珍宝”没有了，再也没人来打扰他了，他的生活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他依旧卖他的拴狗链子，依旧悠闲地喝茶听戏，直到102岁那年，他依旧活得幸福平安、快乐开心……

老铁匠一斧头砸碎“珍宝”，这种处理方法也许并不足取，但他那种不为物役、勇于摆脱物困的勇敢精神，却值得大赞特赞。

人生在世，奋斗的目标尽管很多，但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应是心灵的安宁和生活的幸福。为此，必要的物质财富固不可少，但过多的财富却会像人身上的赘肉一样，成为负担和累赘，从而损害了人们的心灵安宁和生活幸福，因而必须坚决抛弃，远离其害。农夫死抱着金碗不放，只能饿死山野；老铁匠砸碎紫砂壶，生活重归安宁幸福。这两个故事，从正反两方面阐明了摆脱物困的重要。

当然，在这个物欲横流、“享乐第一”的喧嚣世界，要人们拒绝财富或珍宝恐怕比登天还难，关键是要对这些“身外之物”有个正确认识，能对其进行合理支配。比如有人把财富用来搞慈善事业，救助贫苦大众；也有人设立专项基金，收多余的钱财用来推动科学文化事业发展……这些都是摆脱物困，利国、利民也利己的明智之举，值得大力提倡。诚如著名散文家林清玄所言：“第一流的人物，不在于拥有多少物、拥有多少情，而在于能不能在旧物里找到新的启示，在旧情里找到新的智慧，进出无碍。万一不幸我们正在困局里，那么想一想：如果我是一只蛹，即使我的茧是由黄金打造的，又有什么用处呢？如果我是一只蝶，身上色彩缤纷，可以自在地飞翔，那么即使在野地的花间，也能够快乐地生活，又哪会在乎小小的茧呢？”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说得更为形象：“鸟翼上系上黄金，就再也飞不远了。”是啊，“金茧”再美丽，对蝶蛹也是束缚；黄金再珍贵，系在鸟翼上也是枷锁。只有破除“金茧”，抛弃金枷，蝴蝶才能翩翩起舞，鸟儿才能自由飞翔。蝶如是，鸟如是，人又何尝不是？

(本文作者为作家、编审)

【学界往事】

□傅国涌

# 首届“中研院”院士为何缺了钱穆

钱穆无疑就属于这样的“遗珠”，当然，他的学术贡献并不因此而减少一毫的光芒。时间是最好的证明，他的著作今天仍有生命。



1948年6月20日，在美国养病的傅斯年给胡适写信，“话说天下大乱，还要选举院士，去年我就说，这事问题甚多，弄不好，可把‘中央研究院’弄垮台。大家不听，今天只有竭力办得他公正、像样，不太集中，以免为祸好了。”此前，3月27日，“中研院”评议会已在南京先后五次投票选出了八十一位院士，因政见而为国民党当局所不悦的郭沫若、马寅初也在其中。后世对此颇有好评，也可见这次院士评选之公正、像样。

为此在评议会讨论候选人名单时，曾有过较为激烈的争议。1947年10月27日，代表历史语言研究所列席评议会的夏鼐在日记中详细记着，关于郭沫若的提名，朱家骅认为他“参加内乱，于汉奸罪等，似不宜列入”；萨本栋说“恐刺激政府，对于将来经费有影响”；吴正之说“恐其将来以院士地位，在外面乱发言论”。列席会议的巫宝三起立反对，认为“不应以政党关系，影响及其学术之贡献”；陶孟和说“若以政府意志为标准，不如请政府指派”；胡适也认为应以学术立场为主。双方各发表意见，最后无记名投票。夏鼐因系列席者无表决权，不能参加投票，起立说：“会中有人以异党与汉奸等齐而论，但‘中央研究院’为Academia Sinica(中国的科学院)，除学术贡献外，唯一条件为中国人，若汉奸则根本不能算中国人，若反对政府则与汉奸有异，不能相提并论……故对汉奸不妨从严，对政党不同者不妨从宽。”表决



钱穆与夫人胡美琪

结果，14票对7票通过郭沫若仍列入名单中。

胡适、傅斯年与郭沫若政治立场不同，但在最初提出的考古方面候选人名单中均有郭沫若。在这次选出的院士中，史学方面有陈寅恪、陈垣、顾颉刚、傅斯年诸人，没有钱穆。对此，相隔十八年钱穆仍心有不甘。1966年春天，“中研院”将举行第七次院士会议前，有人拟提名他为院士候选人，托其弟子严耕望征询他的意见，但他拒绝提名，相当愤慨地说：“民国三十七年第一次选举院士，当选者多到八十余人，我难道不该预其数！”严耕望认为他之所以被摒于八十一之外，是因学派门户之见：“盖自抗战之前，中国史学界以史语所为代表之新考证学派声势最盛，无疑为史学主

流；唯物论一派亦有相当吸引力。先生虽以考证文章崭露头角，为士林所重，由小学、中学教员十余年中跻身大学教授之林。但先生文化意识特强，在意境与方法论上，日渐强调通识，认为考证问题亦当以通识为依归，故与考证派分道扬镳，隐然自成为独树一帜、孤军奋斗的新学派。而先生性刚，从不考虑周遭环境，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之勇决气概，故与考证派主流巨子之间关系并不和谐。”

1947年5月22日胡适提名的候选人是陈寅恪、陈垣、傅斯年、张元济，傅斯年私下拟的名单上有二陈、顾颉刚、蒋廷黻、他本人等，确实都无钱穆在内。傅斯年给胡适的信中提及因他和陈寅恪都是史语所的职员，史语所不愿提名，希望由北大提出。为何他们可以容得下政见不同的郭沫若，却排斥学术见地不同的钱穆？严耕望提供了一种解释视角。但从夏鼐发表在《观察》周刊1948年11月27日的《“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的分析》来看，很可能还

有另外的因素使当时主办院士选举的学界中人排斥钱穆，那就是他的学历背景。

在当选的八十一人中，留学美国的有四十九人，占60.5%，留学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国的有二十八人，无留学经历的仅六人，四人有进士、举人等科举功名，两人是国立大学本科或研究所毕业。虽然主事者极尽所能，试图保持公正、像样，乃至为郭沫若的入选而发生争论，但就他们的提名来看还是讲究出身来历的。像钱穆这样两头不靠，既没有张元济那样的旧科举功名，也未曾到欧美留学，甚至没有进过本国的大学，与胡适、傅斯年他们素无渊源，这才是他被排除的更深层的原因。钱穆《师友杂忆》中提及，当《国史大纲》出版之后，张其昀告诉他在重庆遇到傅斯年，问及对此书的意见，傅斯年回答：“向不读钱某书文一字。”并指出钱穆屡言及西方欧美的“其知识尽从读《东方杂志》得来。”张其昀说：“君既不读彼书文一字，又从何知之详？”傅斯年无语。此事可见傅斯年对钱穆的看法，尤其看他没有欧美留学背景。夏鼐当时的文章开篇就说：“尤其因为提名的办法不佳，有些可以当选的学者，根本没有被提名，以致无从选出，令人颇有遗珠之感。”钱穆无疑就属于这样的“遗珠”，当然，他的学术贡献并不因此而减少一毫的光芒。时间是最好的证明，他的著作今天仍有生命。

(本文作者为近代史研究学者)